

# 费孝通和村庄生计研究：八十年的回顾

刘能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暨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以费孝通先生的社区田野调查(尤其是江村调查和云南三村调查)为起点, 费先生的村庄生计研究可以分为两个范式, 即古典范式和当代范式。这两个研究范式各自隐含着种种结构性社会前提, 对它们的剖析和阐述可以回答费孝通先生的两个研究范式在关于中国村庄生计的整个研究脉络中所处的理论地位。如今, 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文化和体验的商品化, 以及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技术心智)在乡村地区的渗透和扩散有可能成为影响中国村庄生计模式的结构力量, 对这些结构力量的阐述, 表明费孝通先生所开拓的村庄生计这一研究方向, 至今仍然有其经验活力和理论价值。

[关键词] 费孝通; 村庄生计研究; 古典范式; 当代范式; 结构性条件

[中图分类号] C 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5)02-0018-06

## 一、引言

今年是费孝通先生辞世 10 周年, 作为先生的学生, 笔者认为, 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 我们当前的学术, 还可以从费先生那里汲取哪些养料, 还应该沿着先生所开拓的哪些学术路径继续前行, 以纪念他的学术思想。

从 1935 年 10 月的大瑶山调查开始, 除了反右和文革期间的被迫中断之外, 先生的田野工作时间长达几十年, 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而对村庄生计的关注, 则是这一系列田野工作的一个核心关照点。如果说大瑶山的调查, 先生的主要工作还是以瑶民人体测量为主的话, 那么 1936 年夏天在老家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养伤期间所做的实地调查, 便是典型的社区调查了。关于先生村庄田野调查的起源, 无论是定在大瑶山深处的六巷村<sup>[1]</sup>, 还是定在太湖边上的开弦弓村, 到今天算起来, 总归是接近八十年的时间。

在这八十年时间里, 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大事件, 先是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 紧接着便是内战和土地革命; 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 则把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引入到乡间田陌, 彻底改造乡村的

产权制度和与之相伴随的种种社会文化实践。再往后, 便是改革开放, 我们看到了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勃兴这两大凸显乡村自发性和创造性的内生发展努力。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 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流动人口的身份进入当代城市工业体系之中寻找现金收入的趋势也开始日益明显, 先是集聚在沿海的经济特区, 之后则弥散到全国的都市地带。再之后, 则是一个将近 20 年的农村空心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乡村主流人口的外流之外, 我们似乎还可以看到 1994 年分税制对乡村地区财税基础造成的重大冲击, 1990 年代中期的撤乡并村扩镇(简称“撤扩并”)对乡村地区的社会联带和社会整合造成的损害, 以及 1990 年代末以来农村地区学校实行寄宿制所造成的乡村核心地区对乡村边远地区在人口和现金流上的进一步虹吸效应。尽管在这个时期内, 有退耕还林政策和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均衡化努力, 广大的偏远乡村地区在这 20 年里仍然陷入了一个持续的衰败过程中。这一衰败的过程, 在新世纪开始之后又直接邂逅了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和物化的城镇化(农民上楼)之类的发展主义动员, 使得我们对乡村命运的关注, 又多了几分复杂的感觉: 尽管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重加

[收稿日期] 2014-12-15

[作者简介] 刘能(1970—), 男, 浙江嵊泗人, 社会学博士,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

厚，社会财富的积累效应也日渐显著，但是，边远地区乡村的生计问题，却并没有消失不见，城乡间的巨大差异也依然如故，至今仍然吸引着大量官方的、半官方的和 NGO 的扶贫和开发努力。

想到先生纵贯一生的“志在富民”的宏愿，想到村庄生计议题的当代相关性，因此，在本文中，笔者选择对先生所开拓的村庄生计研究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这一回顾的焦点有三：其一，学术生涯的中断和社会情境的变迁，是否足以将先生的村庄生计研究，区分为古典范式和当代范式？其二，村庄生计模式的有效性，取决于村庄所处的变动中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如果前面关于古典范式和当代范式的区分成立的话，那么在先生的古典范式和当代范式中，分别隐含着哪些结构性的先决条件？其三，在当今全球化和数码化的时代，架构中国村庄生计的结构条件是否发生了变化？而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么都有哪些新的因素需要引起我们当代研究者的关注，从而将村庄生计的研究引向一个新的认知阶段？

## 二、对费孝通村庄生计研究的一个历时性回顾

费先生对村庄生计的关怀，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背景下的自我选择的结果：他和许多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大学时从医学预科转到社会科学，试图从医治个人转变为医治整个社会<sup>[2]</sup>。大瑶山的意外受伤和开弦弓村的养伤，给了他一个机会去观察活生生的、遭受着内外双重压力的中国农村（民）的“具体生活”，在这个具体的生活中，土地权的集中和乡村手工业的凋敝，使得历来属于鱼米之乡的太湖流域村庄，也经历着贫困的煎熬。当然，在这个后来被命名为“江村”的村子里，新的社会实验也正在进行着：蚕丝业在改良之中，村子里也开始出现了引入机器替代人工生产的生丝运销合作社<sup>[3]</sup>。而这，恰好构成了先生生计研究的切入点：在新的结构性条件下，村庄生计的命运是否有可能出现转机呢？

在英伦三岛攻读人类学博士的两年时间里，无论是挚友雷蒙德·弗思爵士，还是他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本人，都认为先生的江村调研资料，具有重要价值，更适合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这一判断背后的学术因缘，在于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因

应着当时变动中的全球情势，产生了重大的战略转向：诸如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久远文明历史的国家，在面对变动着的结构性趋势——[早期]现代化（工业化大生产）和[早期]全球化（国际贸易）——时所作出的社会反应，在殖民地时代的原始部落社会之后，为当代人类学开启了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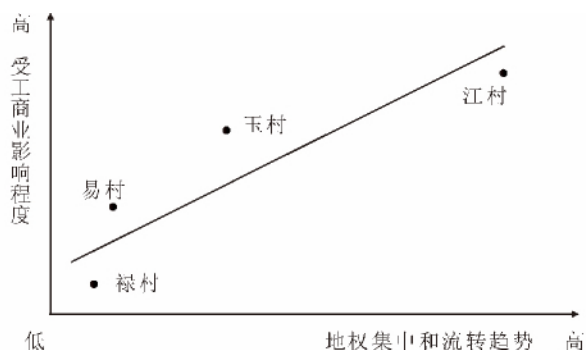
### （一）江村和云南三村研究的理论意义

江村研究和后续的云南三村研究的核心思想，在应用方面，是提出工农相辅作为解决当时中国乡村贫困的有效策略。这一实用主义的立场一直贯穿于先生整个的学术生涯，也是中国学者学以致用、学以致用的哲学伦理的具体体现。我们先来看先生自己是如何对这一应用立场进行解说的。

在《云南三村》一书的“导言”中，先生这样写道：“我初次去禄村的日子离我从伦敦到达昆明时只相隔两个星期。为什么这样迫不及待？《江村经济》最后一段话答复了这个问题。我当时觉得中国在抗战胜利后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我们将建设成怎样一个国家。在抗日的战场上，我能出的力不多。但是为了解决那个更严重的问题，我有责任，用我所学到的知识，多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科学地去认识中国社会。我一向认为要解决具体问题必须从认清具体事实出发。对中国社会的正确认识应是解决怎样建设中国这个问题的必要前提”<sup>[4]</sup>（P3）。除了这个应用性目标之外，江村研究和接下来的云南三村研究，还拥有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重要含义。关于方法论意义，在《云南三村》的“序言”中，先生同样做过总结性的评述：“从《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还可以说一直到八十年代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的研究，中间贯穿着一条理论的线索。《云南三村》是处在这条线索的重要环节上，而且在应用类型比较的方法上也表现得最为清楚”<sup>[4]</sup>（P6）。因此，由江村这一看似偶发的社区调查开始，到魁阁时代云南三村这三个个案的有意识选择——从纯粹农业社区禄村，到手工业发达的易村，再到传统商业繁盛的玉村——先生开创了研究中国乡村社区的“类型比较方法”。

在笔者看来，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的理论意图，即如何去解释一个村庄中的土地制度（离地地主制和地权集中）及其直接社会后果（生计困难）。《江村经济》的理论结论

是，由于与全球化商业体系的近距离接触，以及都市商业力量的强势入侵，造成江村本土手工业崩溃、农户生计艰难，出现家庭财政危机，由此造成地权的流转和集中。云南三村的研究，起源于先生希望对从江村获得的这个一般性理论假设进行检验：“这种见解是否成立，单靠江村的材料是不足为凭的”，因此，通过运用类型比较的研究方法，想去“看一看，‘一个受现代工商业影响较浅的农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样的？在大部分还是自给自足的农村里，它是否也会以土地权来吸收大量的市镇资金？农村土地权会不会集中到市镇而造成离地的大地主’？”<sup>[4]</sup>（P6）正是这一理论意图，使得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脱离了一般的应用性的社区调查的范畴，而进入到了有意识的理论建构的层次<sup>[5]</sup>。从定量社会学的思路来看，先生的这一理论假设似乎可以直接由图1的散点和拟合回归曲线来加以表达。



作为代表内地农村三种独特类型的云南三村，在先生的理论图谱中各自占据着独特的位置：禄村是个远离现代工商业中心的内地农村，人多地少，土地分配不均，但集中趋势不高；缺少土地的村民依靠出卖劳动力成为有地人家的雇工来维持生计；经济上自给自足，商业化入侵的程度很低。易村则是一个以手工业为基础的村子，从土地分配和地权的流动来看，村里并没有佃农存在，只有少数几个大地主在其他村庄也拥有土地，但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现金收入，意味着易村和商业世界的距离，要较纯农业的禄村更为接近一些。玉村靠近县城，是个半商业性的农村，在发展上正处于传统经济开始被现代经济侵入的初期阶段。由于地处商路之上，传统商业的发达使得玉村出现了巨贾大商，这一商业资本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玉村土地的集中和流转趋势，表现为村子里有很多佃农，同时出现了居住在附近市镇的离地地主。可

见，随着外部工商业力量介入的提升，村庄的地权集中趋势也在加剧。

## （二）村庄生计研究的中断和重启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应用意图，是为战争结束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一条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从太湖流域发达农村地区得到的解决思路——工农相辅，经由云南三村研究的初步检验，被证明是在当时中国乡村所面临的结构性条件下的一条可选之道。但是，先生的这一理论判断尚未有机会在更多的社区调查中得到进一步验证之前，政治上的变动接二连三发生。先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以至其最终不兼容于学术体系之中，而1956年开始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则又极大地改变并约制了任何一个中国村庄的生计模式。从先生于1957年5月18日发表于《新观察》的“重访江村”一文来看，当时江村所面临的具体情境是：虽然合作化和集体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的产出，但传统工副业的衰弱（经由日本占领时期对当地蚕丝业的摧毁和以粮为纲战略的挤压），以及集体化初期迸发出来的生活改善预期（“一天三顿干饭”），仍旧使得江村村民家庭中的一部分感受到了粮食紧张的压力。面对这种情境，先生在文章中仍然提出了一种政策上的期待，即在某种程度上保留或恢复乡村工副业，从而确保村庄生计在面临农业自然灾害和村民们变动中的消费预期时能保持相对稳定。文中提出的最新政策建议，是希望在江村广阔的湖泊水面上种植水浮萍之类的饲料以恢复养殖业，并且利用立体水面进行渔业养殖。

这篇文章的写作，代表了先生在不利的气候下，仍能根据社区生活的真实情景进行学术分析。一个个实际问题被提了出来，每一个问题背后实际缘由的推理又能得到实地调查数据的支撑：桑树栽植及桑苗桑叶的分配与蚕桑业衰弱之间的关系、乡村小型工业对于村庄生计所具的扩展效用（技术养成和技术传递的作用），以及农业增产背景下的粮食紧张现象如何解释等等。残酷的现实是，政治气候的突变，使得这篇文章竟而成为先生的罪证之一。此后，他被迫离开学术岗位，直到1970年代末期才又重新恢复学术生命。

先生学术生涯恢复的标志之一，是1981年11月在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当年的赫胥黎

纪念大奖。在颁奖现场的学术讲演中，他以“三访江村”为题，对当时中国农村出现的新气象进行了报告：除了农业产量的恢复之外，江村村庄生计中出现了新事物——不但以桑蚕业为核心的各项副业得到了全面恢复，而且社队企业的兴起，成为江村村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根据先生的研究，苏南地区社队企业的兴起，其实是依靠了很多重要的结构性契机，比如社队集体积累所具的潜在投资价值、城市工业某些环节（如零部件加工）的外包等等。根源于江村传统的因素，是城市工业的发展，在人力资源上吸收了过去在乡村工副业传统下成长起来的技术工人（举例来说，在江村机器缫丝的历史中培养起来的120名熟练技术女工，在1950年代集体化时期，有将近三分之二被招募到邻近的大城市工业体系之中）。这些工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工业停摆的年代，返回乡村，成为社队企业最初发展的人力中介和技术支撑。对社队企业这一新兴事物之后续发展的追踪，结合着对小城镇（集镇）如何从长期的历史衰弱中复兴起来这一问题的关注，构成了先生1980年代以来乡村生计研究的学术主线<sup>[6]</sup>。这一学术主线，如果从研究的分析单位上来看，从村庄扩展开来，进入到了地方性发展模式的归纳，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谋划，因此，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 三、两种范式：从类型到模式

这样来看，我们下面的这个问题就具有重要性了：研究的分析单位的扩展，是否足以将先生早期的村庄生计研究和后续的区域发展模式研究区分开来而成为先生关于乡村生计研究的两大范式？这里的主要议题，在于论证这一区分的可行性。我们认为，先生学术生涯的中断和重启，结合着世界范围的结构变迁，中国社会内部的结构支撑力量的变动，以及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不同，这些的确足以将先生的村庄生计研究，区分为早期范式和当代范式。表1给出了我们的具体理由。

#### （一）理论意图上的差异

从表1来看，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早期范式，其理论意图在于论证，经由土地制度及其地权流转实践的中介，早期现代化和早期全球化这两重结构性趋势合并在一起，以不对称工业竞争的方式，结

合着以高利贷为代表的传统金融实践，造成了中国乡村的普遍衰败和村庄生计的困境。而打破这一困境的解决之道，是将现代工业要素引入到中国乡村之中，以工业产品自主替代和出口竞争的模式，改变这一不利的结构性命运。而在1980年代初以来发展起来的当代范式中，理论语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核心在于，如何在各个结构性条件迥异的区域性乡土社会当中，辨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要素组合，从而论证中国乡村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要素组合的效率。因此，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两大范式，就其理论焦点来看，一个是在农户家庭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上，另一个则是在区域要素组合的相对优势上。

表1 费孝通先生村庄生计研究的两大范式

	早期范式	当代范式
代表性研究	《江村经济》；《云南三村》	《小城镇四记》；《沿海六行》；《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行行重行行》
理论意图	论证土地制度作为解释中国乡村贫困之中介变量，起点为早期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商业资本的入侵和中国乡村传统手工业的衰弱	论证各区域（地方）要素组合的不同，表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存在多样性的选择
方法论基础	类型比较方法	模式论
结构性条件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① 人地比率的约束和生存压力</li> <li>② 溺婴作为人口控制的手段</li> <li>③ 现代工业兴起并且与农业和副业竞争劳动力</li> <li>④ 现代工业产品相比于地方手工业产品具有较高替代性；国际工业产品相较于本地工业产品具有相对优势</li> <li>⑤ 乡村中存在着高利贷之类的金融机制和金融实践</li> <li>⑥ 土地产权的私有化和离地地主制度的高度发达</li> <li>⑦ 国际上的结构性地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li> </ul>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① 人地比率的约束和生存压力</li> <li>② 计划生育代替传统人口控制手段</li> <li>③ 集体化的持续后果：土地集体所有的宪法认定和使用权的相对稳定</li> <li>④ 家户内部的产权安排：家庭细分和家长制的衰弱</li> <li>⑤ 工业消费品的市场稀缺性</li> <li>⑥ 模式要素的结构重要性：无论是苏南模式中的社队工业传统、温州模式中的商业流通技术创新、珠江模式中的土地地租效用，还是民权模式中的“公司+农户”的生产要素空间匹配</li> <li>⑦ 国际劳动分工：中国成为世界工厂</li> </ul>

#### （二）方法论基础的差异

上面关于两大范式理论意图之差异的描述，实际上为我们对两大范式之方法论基础差异的阐明，

奠定了两个基础：首先，我们看到了先生早期范式的分析单位，是单个村庄及其内部的家户经济行为空间，而当代范式中的分析单位，则是处于经济战略创新和选择之中的整个地理区域或亚区域（如黄河上游、浦东、珠江三角洲等）。其次，在早期范式中，先生首创的社区类型比较方法，也即有意识地沿着主要理论变量（现代工商业入侵程度和土地地权的集中程度），寻找到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个案，进行深度的民族志研究，成为具有闪光点的方法论创新；而在当代范式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颇具扎根主义趣向的归纳方法：先有了各个区域的经济创新实践，并且进入到了以先生为首的研究团队的视野中，然后才有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之类的枚举。

### （三）村庄生计范式的结构性条件辨析

我们还认为，支撑着我们关于先生村庄生计研究早期范式和当代范式区分的最后一个理由，是两大范式中隐含着不同的结构性条件。虽然，在两大范式中，有一个结构性前提条件——也即人地比率的约束和生存压力——是两者共享的，更多的结构性前提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在人口控制策略上，计划生育政策代替了传统的溺婴之类的人口控制手段；而将近三十年的集体化进程，也留下了深刻的长期结构性影响，无论是对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定义，还是对农户家庭权力结构的重塑。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中国村庄生计困难的早期结构性前提——手工业制品的高度可替代性、作为经济剥削和经济统治之润滑剂的高利贷金融实践——在当代范式中，分别被另外一些结构性条件——如工业消费品的市场稀缺和集体产权的制度效率（这一点在苏南模式和珠三角模式中更加明显）——所代替。总之，要想理解先生村庄生计研究两大范式的含义，我们首先要对这两大范式所嵌入的结构性条件进行细致的辨析，而这一要求，也成了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探讨村庄生计问题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

## 四、当代语境下的村庄生计：

### 作为研究线索的最新结构性力量

在本文结束之前，为了回应继承和发扬先生所开拓的村庄生计研究这一话题，我们将对在当代语境下如何看待中国的村庄生计问题，做简要的讨论。与1980年代相比，在当今全球化和数码化的

时代，架构中国村庄生计的结构性条件当然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看来，至少有如下三个结构性变迁，值得我们在新时代讨论中国村庄生计时，应该特别加以关注。

### （一）劳动力的全球流动

在先生的早期范式和当代范式中，劳动力的流动始终是村庄生计模式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禄村农田》一篇中，先生描述了村内雇工的存在，成为禄村有产阶级（地主）可以脱离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保障。而在商品化程度高得多的玉村和江村，因为败光田产而不得不在邻近的工商业中心出卖劳动力维生的生计类型，则几乎成了一种被迫的常态。在当代范式中，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要素，即是离地剩余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作为商品交易和商业循环主力军的角色身份；而珠三角模式中则涉及到全国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三来一补”的制造业体系中充当着主流劳动力的事实。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和跨国经济关系的拓展，中国的劳动力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无论是以城市郊区农业劳动力的形式（菜农出口），还是以建筑业服务外包的形式，还是以专业服务技术境外创业的模式（如厨师出口）。

如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成为重大的结构性趋势。因此，在我们关注当代村庄生计时，可以将中国乡村劳动力的全球流动作为一个潜在的结构性条件考虑在内。

### （二）文化和体验的商品化

这里面主要涉及的是对遍布乡村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之商业价值的重新确认、地方性手工艺品的抢救性开发，以及农家乐之类的旅游经济的推广。因此，早期范式中与进口工业品相比处于不利地位的手工制品，到了如今，可能由于其潜在的审美价值或环保价值，而在城市中产阶级中获得提升的“可消费性”（consumability）。其次，乡村世界的原生态饮食体系、舒缓的日常生活节奏、保存完好的社区文化生态，构成了当代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我们讨论当代村庄生计时，如何把握好地方文化和旅游体验的商品化走势，成了一个新的结构性话题。

### （三）移动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渗透和扩散

最后，我们不得不提到移动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渗透和扩散这一重要的结构性社会变迁对乡村生

计的可能性影响。

与十年前相比，中国乡村的通讯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伴随着电子产品价格的回落和数码产品的持续更新换代，伴随着城乡间人口流动的加剧和回流人口的示范效应，我们在中国最基层的乡村社区中，看到了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扩张，看到了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无论是以 3G 手机的形式，还是以台式电脑的形式）的扩散。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行为，网购也开始在乡村的年轻人口中逐

渐流行。另一重新兴的结构力量，是各个互联网巨头的社会企业责任和雄心：包括阿里巴巴、京东和腾讯在内，分别推出了网店下乡、物流体系下乡和移动互联平台（如微信平台）下乡的战略计划。因此，通过互联网交易平台的开发，将乡村地区具有独特价值的物产，与广大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意愿直接挂钩，使得乡村社会获得直接的、未经中间环节盘剥的利润，成为未来我们观察乡村生计的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窗口。

#### [参考文献]

- [1] 徐平等. 大瑶山七十年变迁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 [2] 徐平, 赵仲杰, 郑瑞涛, 魏霞. 费孝通评传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 [3] 费孝通. 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 [4] 费孝通, 张之毅. 云南三村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
- [5] 刘能. 重返空间社会学: 继承费孝通的学术遗产 [J]. 学海, 2014, (4).
- [6] 费孝通. 行行重行行: 乡镇发展论述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 Fei Hsiao-tung and His Village Livelihood Research: An Eighty-Year's Retrospection

LIU Ne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PRC)

[Abstract] Starting from a diachronic review of Professor Fei Hsiao-Tung's community field works, especially the Kaixiangong Village study in 1936, and the Three Yunnan Village studies in early 1940s,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paradigms of Fei's village livelihood research—the classic one and the contemporary one. After briefly defining what constitutes of the two research paradigms, the paper carefully clarifies all the possible implicit structural conditions that these two paradigms have historically been embedded in, so as to answer the ultimate question of what theoretical position has Fei's approach been landed within the entire context of village livelihood research. In the end, a series of contemporary structural forces that might have implicit impact on current Chinese village livelihood, the global mobility of labor forc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ocal culture and the emerging of an experience economy, and the penetration and expansion of mobile internet access (in the form of both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ical mentality) into rural areas, have been examined, showing that the research direction that Fei personally pioneered about eighty years ago still has it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empirical vitality today.

[Key words] Fei Hsiao-tung; village livelihood research; the classic paradigm; the contemporary paradigm; structural conditions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